

READING
CHINESE
VILLAGES

清华同衡系列专著
“风景读书”特别推荐

走读中国乡村

罗德胤 著

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

READING
CHINESE
VILLAGES

清华同衡系列专著
“风景读书”特别推荐

走读中国乡村

罗德胤 著

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读中国乡村 / 罗德胤著 . -- 北京：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，2019.3

ISBN 978-7-5160-2429-4

I . ①走… II . ①罗… III . ①城乡建设—中国—文集
IV . ① F299.2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1626 号

走读中国乡村

ZOUDU ZHONGGUO XIANGCUN

罗德胤 著

出版发行：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44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18.5

字 数：252 千字

版 次：201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9 年 3 月第 1 次

定 价：128.00 元

本社网址：www.jccbs.com，微信公众号：zgjcgycbs

请选择正版图书，采购、销售盗版图书属违法行为

版权专有，盗版必究。本社法律顾问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，张杰律师

举报信箱：zhangjie@tiantailaw.com 举报电话：(010) 68343948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我社市场营销部负责调换，联系电话：(010) 88386906

走读中国
刘国玉书于翁山诗书画院

刘国玉先生题字

上海交通大学海派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、翁山诗书画院院长

罗德胤参与的“乡村建设”活动，正是国家政策引导下建设美丽乡村、特色小镇的创业、创新实践，从实践中探索中国乡村“古镇”“古村”继承和发展结合之路。这本书是他这些年工作的记录，以随笔的形式写下文字，配以照片，结集成册，成书《走读中国乡村》，名副其实。

——秦佑国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）

罗余留香，一路乡建。岁末年初看到一本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《走读中国乡村》。学术与走读结合，传统与现代相随，在生活与行走之间我们看到一个真实而又充满情感的罗老师。我喜欢这种以情代文，学术平民化的文章，信手拈来，让理论与专业回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。

——孙君（北京绿十字发起人、总顾问）

罗德胤老弟用脚行走中国，用心解读乡村，努力探索中国乡土建筑保护实践的新道路。

——戴志坚（厦门大学建筑学院教授、中国民居建筑大师）

罗德胤同志和清华团队在村落实践中，表现出杰出的创新力和强大的执行力，他们在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村落保护与发展之路。

——刘文奎（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）

大学教授里，学术和乡建都做得风生水起的太少，我看罗德胤算一个。

——夏雨清（借宿创始人 &CEO）



记得 1999 年罗德胤硕士即将毕业，广东老家已经有亲戚在帮着联系去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。一天他到我家，说到：秦老师，我看像您一样当一个学者也很好。我说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他说，是的。我说，那你就留下来读博士。

我当时的想法是，罗德胤清华本科毕业设计在乡土组，跟随陈志华和楼庆西两位先生做乡土建筑调查。两位先生 1980 年代开始做乡土建筑调查，成绩斐然、声名卓著。但现在他们已经 70 岁了，田野调查的劳顿辛苦已不合适，乡土建筑组需要年轻人接续。罗德胤倒是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他对乡土建筑研究很感兴趣，他善于和人打交道，“自来熟”，有亲和力，他喜欢摄影，文字能力也不错。

2000 年他成为我的博士生，论文研究方向是乡村戏台建筑。他到河北蔚县调查，发现蔚县古堡建筑很有特色，回来告诉陈志华先生和我，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前往蔚县，车出八达岭长城，经怀来土木堡、鸡鸣驿，南下经逐鹿到蔚县。蔚县的堡寨有历史，有特色，保存的也算可以。看了几个典型的堡子，陈先生很是关注村里留存石碑的碑文，还和村民聊天，指着底部因为堆渣土已经剥蚀的影壁说：“这东西很值钱，不要毁坏了。”陈先生很能把握村民的心态，你说保护古建的那些大道理，不起作用。

2004 年罗德胤博士毕业留校，当了建筑学院的教师，开设乡土建筑的课程，继续乡土建筑的研究，到过国内数十个古村古镇，出版了十本书。

近些年，他进入了“乡村建设”的领域，搞得有声有色，显示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创新精神。这本书是他这些年工作的记录，以随笔的形式写下文字，

配以照片，结集成册，成书《走读中国乡村》，名副其实。

罗德胤的乡土建筑调查和乡村建设研究，采用了社会学的思路和方法，结合建筑学的历史、技术、环境和空间分析，对一个个中国各地村镇的社会生活、风俗习惯、文化特质诸方面，进行描述并分析了历时性的承继和变迁与地域性的特征和差异。

在社会学方面，书中涉及了费孝通《江村经济》的英国功能学派（马林诺夫斯基）和林耀华《金翼》的美国均衡学派（哈佛大学）。我1998年为博士生开了一门课，叫“科学、艺术与建筑”，开了10年。自己讲（少部分），请人讲（大多数），其中有3位是多年请讲的“常聘”，一是李学勤先生讲考古学，一是胡兆量先生讲人文地理，再就是李强先生讲社会学。李强先生是1999年清华大学恢复重建的社会学系的系主任，他给建筑学院的博士生讲了《社会学研究社会的主要理论视角》《中国“丁字型”的社会结构》《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》。也许确有机缘，陈志华先生1947年入清华社会学系，1949年转系来学建筑，毕业后留在建筑系任教，长期研究和教学的是外国古代建筑史，60岁后却开始了中国乡土建筑调查，社会学的背景使他在乡土建筑研究中出手不凡，别开生面。

乡土建筑调查应该做经济调查，要有详实的数据，而建筑界做的乡土建筑调查却甚少这方面的数据。因为调查现在生活在古村、古镇中的人难以得到当年村镇的经济数据，只有回忆性的描述。但做“乡村建设”是现在时，还是需要做有详实数据的经济调查。

在民国时期，中国大学做过中国农村经济调查，其中以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为代表。1921—1925年，该系系主任卜凯（J.L.Buck）组织教师和学生对我国7省17个地区2866个农家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，1930年出版《中国农家经济》（Chinese Farm Economy）；1929—1933年再次组织了对22个省168个地区38256个农家的农村调查，1937年出版《中国土地利用》（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）。他的妻子赛珍珠襁褓中就来到中国，写下了描写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小说《大地》（The Good Earth），1931年出版，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中国现有古村、古镇的老建筑，大都是抗战之前的民国和明、清遗存的建筑。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做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，其统计资料对于研究中国乡土建筑是很有价值的，可以去“挖掘”。

书中谈到第一次古村大会选址在乌镇开，但乌镇是一个“镇”，不是“村”，就有一个问题，乡村研究、乡村建设是否包括“镇”？过去城里人说起“乡下”是包括镇的，那村与镇有区别吗？

大致的区分，“村”是农业生产，种田。“镇”是商业（产品交易、商品买卖）和手工业（各种作坊）。有些规模较小的集镇，在镇的边缘会有少部分农户。

但在 1958 年户口制度实行后，区分最明确的是：村民是农村户口，镇民是城镇户口。公社化后，村是生产队、生产大队（组织农业生产），镇通常是公社所在地（行政机关、服务单位、商业）。

村民有耕地（集体所有，分田到户后是责任田），有宅基地，宅基地上的住房自己可以翻盖（有的二三十年翻盖了数次）；镇民城镇户口，住房是私有，但土地是国有，小镇居民少有翻盖自家住房的，何况一些外来事业编制的人员住房还不是自有的。

所以在经济发达地区（沿海平原地区），现在几乎找不到“传统村落”，都是“新农村”，没有老房子。但“古镇”却不少，保留不少老建筑、大宅院。

1950 年土改前，镇里还住有“大户人家”，自己并不种田，但有数百上千亩的土地在乡下，租给佃农耕种，收取地租。这些“大户人家”土改时被认定为大地主，住房（大院）被没收，其中一些被作为镇里的公共用房（镇公所、学校、粮站、卫生所等）而保存下来，这是后来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。

所以，乡土建筑调查研究需要调查住民是城镇户口，还是农村户口，现住房是宅基地上的农户私产，还是公有（国有）土地上的房产，产权属谁。现在搞“乡村建设”，第一位的问题依然是产权问题。

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：支持农民工、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返乡创业，鼓励企业、其他社会组织和市民积极参与城镇投资、建设、运营和管理，建设

集现代农业、休闲旅游、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的“田园综合体”。

罗德胤这些年参与的“乡村建设”活动，正是国家政策引导下建设美丽乡村、特色小镇的创业、创新实践，从实践中探索中国乡村“古镇”“古村”继承和发展结合之路。

我赞赏“村里开大会”这种多方参与、广泛讨论、共同协商的议事方式，我敬佩参与“乡村建设”的才俊们的胆识、才能和品格。

如果说一点“批评意见”，书中论述和分析乡土建筑的自然因素，地理条件（江河湖海、山地平原、隘口通道等）提到了，却没有把气候因素考虑进去。



2018年冬至日

很高兴为罗德胤同志新书作序。

罗德胤同志（“同志”这个称谓我觉得很准确，既代表了值得保护的曾经普遍流行的一种尊称，也说明我和罗德胤长期志同道合）是我的老朋友。他1992年考入清华建筑学院时恰逢我硕士毕业留校教书并兼做学生辅导员，而罗德胤又是中学时既已入党的“老”党员，是大学期间的学生骨干，因此我们过往比较密切，有师生之谊。

罗德胤博士毕业后也留校，分在建筑历史研究所，主要跟随陈志华、楼庆西等老先生从事乡土建筑方面的测绘、调研与教学。而我则在规划系从事历史旧城保护与整治方面的工作。因我工作时间较长、起步较早，当他开始留校时，我在旧城保护方面的国内实践与国际合作已搞得风生水起了。他是我的“小老弟”，性格很合得来，都来自南方，对文史哲地理方面都很有兴致，因此在组织“东中亚历史城市会议”时我经常把他拉上，共同游历了越南、土耳其等很多地方。国内项目也偶尔把他邀上作“顾问”，一方面在旧城传统民居方面他确实是专家，另一方面也是尽我所能给他创造一些能有微薄收入的工作机会，因为乡土调研实在太清贫、太辛苦了。老先生可以安贫乐道，年轻教师还是要吃饭、恋爱的。

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，罗德胤迄今的学术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：一是前期的乡土建筑调研及测绘，二是后期的乡村保护性整治规划设计。

前期他刚留校，主要是协助陈志华、楼庆西、李秋香等前辈老师工作。陈、

楼两位先生都曾经直接教过我，我本科时的外国建筑史（十九世纪以前）教材就是陈先生编写的。楼先生曾经做过我院书记，是一位极其平易近人的长者。退职后投身于中国传统建筑的深入研究，取得了很大成就。几位老先生无论在学识还是在人品上都堪称楷模，罗德胤一留校就能跟他们合作应该讲是一种幸运。

老先生们没有简单将罗德胤当壮劳力，而是真正让他放手工作并独当一面。这一阶段，罗德胤可以说是成绩斐然、硕果累累，仅我获赠并仔细阅读过的就有《蔚县古堡》《仙霞古道》《廿八都古镇》等等，个个内容丰富、装帧精美，不仅在本领域，而且在相关行业甚至大众社会都引起很大反响。这些书籍长期占据书店样板书、畅销书行列，影响远播海外。

与宫殿、坛庙等官式建筑相比，乡土民居与聚落在建筑史研究中一直属于小众性的边缘学科。二战前期，梁思成、林徽因、莫宗江等先生筚路蓝缕，深入城乡，对中国古建筑做了大量第一手的测绘并进行了系统性地分析，但他们所选择的案例大多是规模比较大、地位比较高、“水准”比较好的官式和宗教建筑。1949年以后，华南理工大学的陆元鼎教授、昆明理工大学的蒋高宸教授等对岭南民居、云南民居等做了大量系统性的研究、出版了很多专著。但他们完成的工作与遍布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、浩如烟海的乡土民居相比，不敢说九牛一毛，也可谓挂一漏万。

感谢 AutoCAD、三维扫描等技术手段的发展，现在的乡土民居测绘跟以往相比，可以做到速度更快、质量更精准；交通路网的改善使优秀民居和村落更容易被发现、更容易到达；百度等网络检索工具的产生使相关文化背景的研究也变得更加便捷。因此，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很多大学结合学生测绘实习又掀起了新一轮民居调研的高潮，其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组应该讲是国内规模最大、积淀最深、成果最为突出的一个团队。

新一轮乡土建筑的研究跟以往相比不仅规模大，而且意义更加突出，因为它赶上了两个“大时代”。首先它顺应了国际文化遗产概念变迁的大时代。按照过去的观点，只有在历史、科学、艺术等方面有重大价值或与某些重要人物、重要事件有关的建筑或遗址才能被列入文物，而现在一切能代表一个

时代典型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建筑和聚落都应被列入保护对象。其次，它赶上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新农村建设“大时代”。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反哺农村来达到城乡服务均等化，以实现城乡统筹。常用的手段包括改水、改路、改厕等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少传统民居和村落被当作落后生产生活方式的体现被大规模改造，甚至被迁村并户。因此，在这种“建设性破坏”的时代背景下，新一轮乡土民居测绘不啻为抢救性的资料保存。

测绘工作做完了，精美的书籍出版了，理论上讲“学术”工作就算完成了，但这样的态度是不道德的。学以致用，任何学问从根本上说都是致用之学。抢救性测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关键的是后续工作——如何保护？特别是如何利用？法国文物保护的先驱 Violette Le Duc 早就说过“对文物保护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找一个合适的用途，好好地利用它”，他嘲笑了书呆子式的保护方法。罗德胤第二阶段的学术活动主要就是在这方面下工夫。

乡土民居不同于宫殿坛庙，它数量极大、分布极广，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等待各级文物部门下拨经费保护，而必须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己找出路。现在比较普遍流行的方式是旅游，意大利佛罗伦萨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宗旨的 Romaldo Bianco Foundation 基金会的口号就是“Conservation Through Tourism”，这说明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。感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，近些年来乡村度假作为一种新兴旅游方式得到井喷式发展，实际上周庄、乌镇等江南古镇的开发也应属于这一范畴。但这些古镇由于交通过于便利、开发利用强度过大，已普遍呈现过度商业化的问题，人们开始寻访更具乡土气质、更“原汁原味”的乡村观光度假地。

因专业研究，罗德胤同志知悉很多自然环境十分优美、建筑规划极有特色、土特产品琳琅满目的传统村落。但它们也有它们的问题，一方面是名气太小，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太差。针对第一个问题，罗德胤发明了一种“会议事件”的模式，即与地方政府合作，邀请专业会议策划公司出面组织，由他利用自己的学术人脉资源，广邀各方面相关专家，到“乡下”去开会，特别是利用微信、微博等新式移动传媒，广泛宣传，一次会议的网络点击量能

达到上千万，这样就大大提升了相关传统村落的知名度。针对基础设施欠缺的问题，他发动清华同衡规划院传统村落研究所的团队，进行环境整治规划。但这种规划设计秉持最小干预的原则，以尽可能遵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要求的保护“原真性、完整性”。同时，他极力邀请民宿接待、小吃餐饮、纪念品生产的从业者加盟同往，以营造全方位的接待条件。这方面的实践本书将逐一做深入介绍。

罗德胤同志德才兼备，既勤于学习、善于思考，又以诚待人、能团结同志，相信他在乡土聚落的保护与利用的道路上会越走越广，以实现一位清华学子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。祝他成功！



2019年1月

前

言

不知不觉，已经在《风景读书》上写了整整一年的专栏。《风景读书》是大地风景公司开设的一个微信公众号，目的是给同行们推荐好书。这是一个纯公益和学术的事业。作为一个企业，能真金白银做学术，而且是持续地做，是相当不容易的。

一年前，大地风景受国家文物局委托，开展了一个研究传统村落文物资源活化利用的课题，我受邀参加了一次课题研讨会。那次会后，《风景读书》的几位编辑专门把我留了下来，希望我可以在她们刚刚筹办起来的公众号上设立专栏，名字就叫“罗德胤专栏”，每周提供一篇稿件。编辑们大概是害怕给我太大的压力，所以给了我比较大的自由度。内容上，可以是选读一本书的1~2页，也可以是去看过某个村落之后的感想，或者干脆是某次会议的发言整理稿。篇幅上，只要读出来是10分钟左右就行，短的别少于5分钟，长的别超过20分钟。

这算是碎片学习的一种方式。碎片学习，是近年兴起的一个现象。有人批评，有人说好。批评者的理由是：这样的学习没有深度。支持者的理由是：现代人的工作太忙，很难有大段的专门时间学习。两派观点，各有道理。从现实趋势来看，似乎是支持碎片学习的一派暂时占了上风。深入学习，一是时间的成本高，二是意志力的成本也高，做起来确实有困难。而碎片学习，尤其是用音频的碎片学习，这两方面的成本都要低多了。上班族在吃早饭、开车、坐地铁甚至等电梯的时候，都可以戴上耳机，给自己的大脑“充电”几分钟。我自己，就是利用这些碎片时间，听了好些之前想读而没能读的书。

我也知道听别人摘过的书，效果必定没有自己钻进书本去认真研读的好，但是，听了总归又比完全没读要好。而且，有的书，明明之前也认真读过，但是花二三十分钟听专业研究者摘出来的内容，竟然在印象上要更深刻，感觉上也更有收获。听书这事，对于那些不想当作专业，但是又想对它有所了解的知识，还是挺有好处的。

所以，依我看，碎片学习和深入学习，可能只是两种并存的学习之道。它们之间，并不是互相竞争的关系，而只是分工不同。专业性的学习要花大段时间，专门而深入，扩展性的学习可以利用碎片时间，灵活而自由。碎片学习的竞争对手，不是深入学习，而是消遣娱乐——对于场景转换之间所产生的无聊，你是愿意用相声和抖音来打发呢，还是愿意学习一点新知识来打发？

赶赶时髦，是我之所以愿意加入《风景读书》的一个原因。我已经碎片式地学习了一两年，现在也要尝试一下，自己制作这样的内容是个什么样的感觉。不过，我在写专栏这件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私心，那就是重新捡拾起曾经陪伴我多年的写作工具。

大约在 2001—2011 年的十年间，写作是我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内容。一开始是为了拿到毕业文凭。读了博士，总得交博士论文。建筑史类的博士论文，十几二十万字总是要的。对于只写过几万字硕士论文的一个年轻人来说，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。好在这样的博士论文，有着大致的体例，又依赖大量的调研，所以只要把调研工作做足，再按照体例一步步写，然后按照导师提出的意见修改，基本上就可以完成。

毕业之后，加入了清华大学的乡土组，工作是接着写作。这回变成了乡土建筑的调查报告。幸好，这依然是有榜样可模仿的。清华乡土组大约从 1990 年开始，就专门从事全国各地的乡土建筑研究。陈志华先生开创的研究方法，是以一个典型的乡土聚落，或者一个文化区域内的乡土聚落群作为研究对象，进行整体性的研究。在写作体例上，通常是对聚落的地理历史、聚落构成、公共建筑、住宅建筑等内容，分章节展开论述。按这个体例，我写了有六七年，几乎是以每年一个课题的速度，完成了几部书稿。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乡土组在调研方法和写作方法上，都有相对成熟的路径。当然，在这期间，陈先生对我的书稿的修改和打磨，也起了巨大

作用，不但对我的整体思维有建构意义，也对我的行文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另外不得不提到的一个模仿对象，是陈先生和李秋香老师合著的一本书——出版于 2004 年的《古镇碛口》。这本书在“中华遗产·乡土建筑”系列著作中，应该是属于知名度不太大的，但是它在整体结构上的完整性和逻辑推进上的严密性，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。可以说，我那几年的书稿写作，以及后来的文章写作，都是有意无意中将《古镇碛口》这本书作为参考标准的。古人的说法：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”有个追赶的目标总是件好事，可以让我们有明确的前进方向。

从 2012 年开始，我的工作重心从调查研究转向了保护实践。保护实践和调查研究有着很大区别。调查研究是一年盯住一个地方，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深入地做。保护实践，虽然也要聚焦，但不是在一个地方，而是每年在几个地方流转；虽然也是小团队工作，但不是一个人主笔，而是四五个人分工合作。另外，为了提高保护实践的水平，我们还得经常去看别人做的项目，尤其是有成功之处的项目。这么一来，出差考察和开会讨论就成了我的生活常态。因为出差多，自然是没法集中起大段时间，来完成一部专题书稿了。但是出差多也有好处，那就是随着看到的案例多，听到的想法多，容易产生相互比较，这就导致我自己时不常会有一些小的思考和小的发现。

在过去的几年，我对这些小思考和小发现的处理办法，是每隔三五个月，就把它们添加到上课的课件里，或者写到某篇杂志的约稿里。不管是哪种，写作的强度和频率是大不如前了。

处于这么一种状态的我，在接到《风景读书》的邀约时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：是不是有可能利用这每周完成一篇的，并不算太大的压力，让自己把出差期间产生的那些小思考和小发现，更多地整理成文字呢？

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写作是需要思维上的闪光一现的，但是也离不开强迫或者半强迫的专注。如果我真的能完成每周一篇的任务，最大的受益人无疑是我自己。因为，我的这些不知道有用还是没用的小思考和小发现，就可以通过“必须写出来”的形式，得到更深入的挖掘和更系统的整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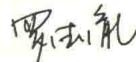
这么试验了一年，算是坚持了下来。现在，我交上这份卷子，跟读者们集中分享这一年来关于乡村工作上的点滴收获。

既然是结集成书，就得有个书名。编辑们和我一起，想了几个书名，最后还是觉得“走读”这两个字，既符合我边在出差边写作的特点，又嵌入了《风景读书》公众号的一个字，最能反映这些文章的诞生过程，所以书名就定为《走读中国乡村》。

结集成书，也要考虑到书有书的结构，这跟专栏文章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是不一样的。去掉一些篇幅较短或者信息量较少的文章，我把入选的 32 篇大致分成了四类。第一类是对乡村文化的解读，这些文章算是我在前些年做乡土建筑研究的延续。第二类是对实践案例的分析，这些案例都是最近这几年新出现的，包括我们团队自己做的项目，也包括同行朋友们做的案例。第三类文章，是对“村里开大会”这件事的反思和总结，从 2016 年 4 月到现在，我们已经举办了六次这样的大会，从最初单纯的开会交流，逐渐发展到将会议的规划建设、会中的宣传交流和会后的运营培训都结合起来，成为一个立体而系统的事件。第四类文章，可以说是另一种方式的案例分析。第二类文章的案例分析，侧重于技术和路径，而第四类文章则重点从人的角度来展开。乡村振兴，产业为先。而乡村的产业能不能做起来，关键又是看人，所以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观察和了解乡村工作中人的因素。

专栏文章，因为是每周一篇，限时推送，有的问题就来不及仔细研究与核对，所以也恳请读者们批评和指正。书中文章，大部分都以“村”为研究对象，但是有时也会讲到镇，甚至县城。本书所说的乡村，并不以严格的行政区划为标准，而是大致意义上的乡村。本书出版之前，经导师秦佑国先生仔细审阅，并就其中若干问题提出了修改建议。看着秦先生用铅笔书写在文稿上的小字，我感觉时光仿佛回到了研究生时代。

最后，要郑重感谢为专栏发布和结集出版做出巨大贡献的几位编辑朋友：《风景读书》的四位编辑——林丽琴、刘原原、吴天颖、邓利杰，正是她们每周定时的编辑发布，鞭策了我按时交稿；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的章曲，她的及时反馈和参与讨论是我能坚持下来的重要动力。



2018 年 10 月 18 日